

主 编 黄舍骄

春 华 秋 实 四 十 年

中法建交回忆录

53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 编 黄舍骄
副主编 宋敬武 陈 栋

D829.565-53
H882

春 华 秋 实 四 十 年

中
法
建
交
回
忆
录



20021951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 / 黄舍骄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2

ISBN 7-5012-2189-8

I. 春... II. 黄... III. 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现代 IV. 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2287 号

主 编
副 主 编

黄舍骄
宋敬武
陈 栋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程 立
程 跃
王勇刚
马莉娜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经 销
排 版
印 刷
开本印张
版 次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新华书店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1/32 11 印张 26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2004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回首四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与精心浇灌下，中法友谊之树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已由当初的幼苗而愈益枝繁叶茂，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可以说是时势使然，同时也和毛泽东主席与戴高乐将军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邓小平1975年访问法国时说过，把中法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到的要多得多。

法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构筑全面伙伴关系的西方国家。1997年5月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共同做出这一决定，将两国关系带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政治上，基于对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共同追求，两国高层交往密切，双边磋商日益深化，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两国在航空、航天、核能、汽车、水电、交通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法国对华技术转让在欧盟国家中名列前茅。文化上，两国同为文明古国，近年来交流十分活跃，两国决定互设文化中心、互办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

文化年，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

法国还是第一个在中国“非典”时期派总理如约访华的国家。拉法兰总理的来访给处于抗击“非典”关键时刻的中国人民以宝贵的政治和精神支持。胡锦涛主席高度评价中法间这种真挚友谊，称之为“患难见真情”。

本书的撰稿人大多是长期从事对法外交的资深外交官。他们是中法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中法交往中风云际会的重大外交事件，也不乏一些鲜为人知的插曲和花絮，构成一幅中法关系的历史画卷，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让我们共同祝愿中法关系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錢其琛

2003年10月31日

目 录

1	前 言	钱其琛
1	亲历中法建交	张锡昌
47	中法建交谈判回顾	李清泉
67	庆祝中法建交二十周年	黄 镇
71	五星红旗飘扬在巴黎上空 ——中法建交回顾	宋之光
79	难忘法兰西	曾 涛
116	出使法国	韩克华
126	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法国的成功访问 ——李先念主席 1987 年访法追忆	周 觉
144	我所知道的中法首脑交往 ——出使法兰西的片段回忆	蔡方柏
164	发掘中法合作的潜力	

把中法关系推向新高峰 吴建民
——庆祝中法建交四十周年

172	邓小平访法实录	黄舍骄
195	“为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长远发展 努力播种！” ——回忆胡耀邦总书记 1986 年访法	朱 良
209	一次继注开来的访问 ——记江泽民主席对法国的首次国事访问	陈起元
219	中法建交四十年再回首	张锡昌
236	回眸中法建交全过程	张国强
251	我在南特见到了温书记	陈 栋
260	希拉克总统的中国情	梁志斐
272	追忆法国人民纪念戴高乐将军的盛况	于志岚
279	闲谈中法文化交流	吴春德
288	珍贵的题词 友谊的佳话 ——纪念希拉克总统为《希拉克传》 中译本题词八周年	曹松豪
301	令人难忘的法国校园生活	董津义
309	献上我心中的一片红叶 ——缅怀法国著名对华友好人士佩雷菲特先生	曹松豪
319	为中法经济合作篇章添彩 ——记“神龙富康”与黄松先生	羲 豹
328	中法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蔡方柏



亲历中法建交

张锡昌

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有力地冲击两极格局，打开了通向超越集团对抗、发展无私合作的国际关系的新路子。中法建交举世瞩目，堪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精彩之笔，也是我在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40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水到渠成

1955年10月，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达尼埃尔·麦耶率该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会见代表团时指出：“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有利于我们和平共处。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说穿了，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



面，而且会走在英国前面。”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1962年3月18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长达七年零八个月的阿尔及利亚战争。7月3日，戴高乐宣布：“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132年来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告终。

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起，法国政府就考虑过承认中国问题。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国承认我国当年的对手胡志明的缘故，此事没有下文。1954年日内瓦协议缔结后，承认中国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最近几年中国的敌对态度（指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情又耽搁下来了。1962年，这一障碍业已清除，承认中国已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了。”

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期以来使法国陷于分裂和动荡，损耗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削弱对外行动能力的殖民危机已告结束。正如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所说：“自阿尔及利亚独立之日起，我们才能在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上采取真正的国际行动，诸如打开对华关系，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承认中国问题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戴高乐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戴高乐手下的新闻部长、政府发言人阿兰·佩雷菲特在1994年5月巴黎举行的纪念中法建交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首次披露了戴高乐在多次内部谈话中对法中关系的想法。笔者亦应邀与会。这些谈话为了解中法建交的进程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线索。

1962年6月6日，戴高乐第一次同佩雷菲特谈到中国问题。三天前，戴高乐曾接待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戴高乐说：“我们谈到中国人。麦克米伦对中国人口众多和实力强大感到不安，他想以‘防疫线’封锁中国。他认为，中国威胁英国人所关切的诸如印度等国。我认为不必如此担忧。中国人太穷了，他们怎么会与邻国为敌呢？怎么会与印度为敌呢？……当然，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制造原子弹。但是，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中国人只有向全世界开放，得到世界上的帮助，才能摆脱贫困状态。他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全世界越是猜疑他们，越是把他们推到一边，他们就越会闭关自守。我一直认为，自从解放军取得胜利、蒋介石逃往台湾后，世界的利益就在于有朝一日同中国人对话，同他们达成谅解，同他们做生意，以便使他们得以走出万里长城。不应当让他们自受煎熬，不然，他们会暴跳如雷。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奉行封锁、包围的政策，从来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使被包围的国家变得危险起来。”

末了，戴高乐嘱咐佩雷菲特：“当然，现在不能露出半点风声。”

五个月之后，在11月7日内阁会议上，外长德姆维尔就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国印度冲突发了言。戴高乐说：“古巴危机和中印冲突，这是两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两者似乎并无联系，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看到中苏两大国的较量，中苏将分道扬镳。”

1963年1月24日，为了准备即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戴高乐又同佩雷菲特谈起中国问题。两人进行了有趣的对话。

戴高乐说：“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题目。现在中国究竟怎么样？20年之后，它又会是怎么样？”

佩雷菲特问道：“您是不是老在考虑承认中国的问题？”

“当然啰！总得由我来做这件事。”

“英国已经这样做了。”

“不对。归根到底，英国做了，但又没有做成。这不过是白费力气。英国只派了一名代办，主要是用来维持贸易关系。再说，中英之间还有香港问题……”

“一旦您承认中国，美国人会大发雷霆。”

“那又怎么样？”

“如果您承认中国，它终将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嘛！那也无伤大雅！”

同年3月13日内阁会议上，德姆维尔外长谈到赫鲁晓夫猛烈攻击中国的言论。会后，戴高乐对佩雷菲特说：“我们不必卷入中苏之争。我们应当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在莫斯科，出现在北京。我们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借口是美国不喜欢这个政权。这是不正常的。”

1963年7月23日，德姆维尔外长在内阁会议上谈到，中苏关系已濒临破裂，同时，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就禁止核试验进行谈判。戴高乐在会后说：奇怪，这真是巧合。一方面，中国人同苏联人分道扬镳；另一方面，美、英、苏将就核禁试达成协议。但是，这三家无法反对我们



干我们的，也无法反对中国人干他们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同北京恢复关系，我们承认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有一个国家治理着中国，已经治理了 14 年之久。不论是好是坏，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不是我们的事。这个国家治理着中国。这是不容置疑的。

1963 年 9 月 21 日，戴高乐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会谈，一再谈到承认中国问题。阿登纳说：“对我们欧洲人来说，中国并不构成威胁……欧洲国家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好处……为什么法国不向中国派个代办？要是法国这样做，联邦德国就会跟上。”戴高乐回答道：“当然，这种想法正在酝酿之中。不过，承认中国有不少麻烦之处：有台湾问题……由于美国人的关系，此事也相当麻烦。”接着，戴高乐又改换了口气：“确实，由于中苏分歧，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这个新因素改变了问题的内涵。”

从戴高乐这些鲜为人知的内部谈话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和国际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的重大变化，法中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事实上，这时戴高乐已准备采取打开对华关系的具体步骤。不过，他没有向他的好朋友阿登纳透露。

戴高乐谋求打开对华关系的时机，是与美国侵越战争急剧升级直接关联的。1963 年 8 月 29 日内阁会议后，法国政府首次发表由戴高乐亲自拟定的关于越南局势的正式声明，对“越南的严重局势表示深切不安”，提出越南“对外独立，国内和平统一，同邻国友好”的主张，表示法国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越南“真诚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声明强调，“应该由越南人民，而且仅仅由越



南人民来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含蓄抨击了美国对越南的武装干涉。

戴高乐深知，单凭法国的力量不足以使美国改弦易辙。戴高乐希望借助中国制约美国，推动越南问题取得法国所期望的政治解决，以利法国重返东南亚。因此，戴高乐深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

至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联系，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在其《一项外交政策（1958—1969）》一书的说法给戴高乐的思路做了脚注。他在书中写道：“1963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已深深陷入印度支那战争之中，法国公开表示反对。美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最终只能实现政治解决。促使美国原则上接受这种政治解决，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必须由亚洲最大的国家、越南和老挝的近邻——中国直接参加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法国认为，“没有中国参加，将一事无成。”“为了为政治解决铺平道路，巴黎怎能对谋求同北京直接对话犹豫不决呢？”打开对华关系势在必行。

就在法国政府发表关于越南局势的声明的那一天，戴高乐急欲召见富尔研究法中关系正常化问题。总统府派人到处寻找富尔，未见踪影。原来，富尔正在瑞士著名的休假地达沃斯优哉优哉。总统副官得知后，给富尔挂了长途电话，告以戴高乐紧急召见事。但未说明原由。富尔夫人是个机灵人，她分析道：“眼下正值休假季节，不会是政府改组的事。再说，将军是非常讲究照章办事的人，若是要你参加政府，必定先由总理同你联系。我想，十有八九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还是富尔夫人猜中了。戴高乐召见富尔，正是为了法中关系问题。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宴请富尔夫妇。戴高乐对富尔说：“我曾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富尔答道：“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说，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独立的信息，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无关紧要。”

两人谈话中间，富尔使用的一个关键性字眼，戴高乐竟然不懂，富尔大为得意。富尔是这样说的：“人们不能对6亿人口的国家视而不见。”戴高乐问道：“啊，视而不见（SCOTOMISER），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可不知道有这么个字。”原来，富尔把“盲点”（SCOTOME）这个名词添加几个字母，变作动词来使用，这是他杜撰的。富尔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法国必须承认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存在的事实。这正合乎戴高乐的想法。

事有凑巧。富尔在达沃斯休假期间，曾于8月20日去伯尔尼会见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再次访华。他表示，此行纯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使命。不过，他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法中关系交换看法。他强调，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是不正常的，他认识双方领导人，并同他们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富尔再次访华，同上次一样，仍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出面



邀请，以示此行系非官方性质。8月31日，李大使前往达沃斯富尔住地，告以中方同意他10月下旬访华。

于是，富尔对戴高乐说，他正好从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收到再次访华的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乐当场决定：“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立即商定，这次访华对外称纯系私人性质。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在印度逗留，会见尼赫鲁总理。在座的总统府秘书长比兰·德·罗齐埃认为，在戴高乐心目中，赋予富尔的不是试探性使命，而是委托他前往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谈判，并期望谈判能取得圆满结果。9月3日，富尔电话通知中国驻瑞士使馆，抵华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对中法关系至关重要的富尔第二次中国之行就这样迅速敲定了。

水到渠成。戴高乐终于正式启动法中建交的进程。在此，我们引用戴高乐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是最恰当不过的：“当年我所做出的决断，不管是对还是错，我认为，那绝不是轻率从事的。”

秘 密 使 者

1963年10月21日，笔者奉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来到骄阳似火的深圳罗湖。此地，今日已是深圳鼎盛繁华的金融工业中心，当年却不过是很不起眼的边境弹丸之地。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



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经特许，笔者步入桥头，伫立在路障我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滚滚人流中捕捉我要迎接的客人的身影——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夫妇。忽见人群中一个秃顶的高个儿老外在使劲挥手。哦，他已经认出我来了。我也赶紧挥手示意。1957年富尔夫妇第一次来中国，我曾接待过他们，所以老远就认出来了。这时，专程前来迎接的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同志也过来同富尔夫妇握手致意。

富尔在香港对记者说，此行纯系私人性质。这不过是向外界施放的烟幕。实际上，他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使者。他在行前又专程去瑞士会见李清泉大使，说明他见了戴高乐将军，强调“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携有戴高乐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富尔究竟以何种身份访华？负有何种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这是我们急需当面摸清的底细，以利于中央确定对他的接待方针和规格。

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我们总设法把话题拉回到他的访华使命。他强调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自称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的一封亲笔信，将面交中国领导人。

这封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



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进行会谈的。戴高乐表示知道富尔将同中国领导人接触，而且非常重视法国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戴高乐强调，他事先已同富尔谈过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完全相信富尔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富尔听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这最后一层意思，不是一般的外交套话。出诸一国元首之口，这句话具有“授权”的涵义。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一旦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范围，事实上是受戴高乐委托前来同我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于是，我们当即决定，在预定的高低两种方案中按高规格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我，还有前来协助接待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同富尔上次访华坐在普通软席车厢里自然大不一样。从富尔夫妇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此行非同一般。当晚，由广州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富尔对这种礼遇自然极为敏感。事隔九年之后，他在《承认中国》一文中回顾道：“刚刚抵达中国，我就感受到，传统的接待规格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在广州，市长本人亲自接待我们，而不是按通常的做法，由一位副市长出面。”